

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空间想像与后殖民生态意识

Spatial Imagination and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Life of Pi*

江玉琴 (Jiang Yuqin)

内容摘要: 20 世纪空间研究的逐渐热化及后殖民生态批评对空间研究的重视, 为理解《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开拓了新的视角。《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空间演进建构了表面的人与动物之情感关系、内在的东—西方之文化关系。其中本地治里的动物园以人与动物的伊甸园般生活再现了后殖民文学中固有的西方对东方的想像, 遮蔽了这一幻像背后动物园本身存在的人与动物之权力宰制、西方对东方之统治关系; 海上救生艇上派与孟加拉虎之领地之争表征了人与动物之异托邦、西方对东方的动物贱民喻指, 本质上贯彻了西方殖民扩张过程中鲁滨逊驯服土地、建构西方秩序之精神主旨; 多伦多作为西方都市之表征, 成为了东方流散者的幸福之地, 完美再现了东方对西方的皈依, 成年派在多伦多的东方怀旧再现了生活于西方世界的东方流散者内化的东方主义倾向。三个空间的社会文化隐喻也反映了作者本质上的东方主义观念。因此《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人与动物关系的生态指涉仍然无法逃脱后殖民批评中西方对东方的教化与统治。

关键词: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东方幻像; 异托邦; 重新东方化; 东方主义

作者简介: 江玉琴, 现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

Title: Spatial Imagination and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Life of Pi*

Abstract: The turn of Spatial studies in 20th century and the focus of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on Spatial studies promote people to get a new understanding on *Life of Pi*. *Life of Pi* represents the varia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 in the different spaces under the gaze of western eyes. They are oriental illusion for the Indian zoo in Pondicherry, heterotopia for human and animal on the lifeboat of the Pacific Ocean, re-orientalism for diaspora ethnic in the postcolonial nostalgia Toronto. Those relations reflect orientalism from author Yann Martel and diaspora narrator Pi Partner. This novel is still in the range of hegemony for the West to the East.

Key words: *Life of Pi*; Eastern Illusion; Heterotopia; Re-Orientalism; Orientalism

Author: Jiang Yuqin is a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i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Her main research includes stud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theories. Email: jyq@szu.edu.cn

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 (Yann Martel) 的小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 下简称《少年派》) 自 2001 年出版以来一直获得热议。人们非常关注《少年派》故事中派与孟加拉虎的海上幸存故事, 并将其看作是一种新颖的人类—动物关系、海难与幸存叙事、创伤叙事等。¹ 也有学者强调这一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后殖民性, 认为这种关系反映了西方食肉主义与殖民主义观念的发展, 或者批驳了人类与动物关系就是帝国和殖民地关系的类比等。² 上述论述认识

1 这类研究聚焦在 Roman Bartosch、June Dwyer、Rebecca Duncan、Laura Wright 等人的论述。Bartosch 反复强调需要重新协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边界, 认为马特尔质疑了传统的人与动物关系, 并最终解构人类—动物边界。这在 Bartosch 看来是致力于走向一种人类—动物共同体, 在可持续性环境发展的工作中向前迈进了一步。See Roman Bartosch, *Environmentality: Ecocriticism and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Fiction*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13) 第七章 “Negotiating the Human -Animal Boundary: Intertextuality and Metafiction in *Life of Pi* and *Beatrice and Virgil*.”

June Dwyer 认为这本小说中的船只失事与生态关怀密切相关。在论文 “Yann Martel’s *Life of P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hipwreck Narrative”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2005(2)) 中, Dwyer 提出船只失事不能简单看作是文学叙事的一种方式, 而应该以生态学者的视角看到自然在其中发生的作用, 特别要认识到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在两者成为沉船上的幸存者时尤其重要。因此 Dwyer 提出, 马特尔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让人们来重新理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即改变了人类统治动物的关系。《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人类文化与动物文化的对话提供了可能性。Rebecca Duncan 则认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一种后现代幸存故事叙述, 呈现了主人公的后现代身份, 同时还表现为一种创伤叙事。See Rebecca Duncan, “*Life of Pi* as Postmodern Survivor Narrative,” *Mosaic: a Journal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 2 (2008):167. Laura Wright 也提出这本小说是海难故事的延续, 是对西方经典海难文学《鲁宾逊漂流记》的逆写。在救生艇上, 少年派与孟加拉虎创造了一种无需使用语言的共同体, 他们通过声音和行动来理解各自的能力。See Laura Wright, *Wildness into Civilized Shapes: Reading the Postcolonial Environment* (Athens & London: U of Georgia P, 2010) 73.

2 Graham Huggan 与 Helen Tiffin 在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一书中专辟一章探讨动物批评与后殖民批评之间的关系。其中他们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文本对象, 阐述了基督教、食肉主义与起源神话之间的关联, 认为在这本小说中, 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应该走向一种相互依存的非寻常联盟。See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175. Roman Bartosch 在分析小说的具体内容时也反复提醒我们人与动物的故事也常与种族话语相关。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新的途径来找到方式理解人类和动物的“他者性”。See *Environmentality: Ecocriticism and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Fiction*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13) 194.

到人与动物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生态指涉，其文化涵义关涉西方与东方、帝国与殖民地的历史与文化认同。显然无论是关注作者本身，如马特尔在前言中进行的跨文化语境观察并就此描述跨文化语境生活的人物故事，还是小说作品中主人公派呈现的文化怀旧，这部小说的确无法剥离其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因此这部貌似生态故事的小说，其实深入演绎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东方流散者的文化伤感与最终走向的西方文化皈依。而这一情怀掩映在少年派与孟加拉虎的海上幸存故事中，往往为人所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空间呈现与空间意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少年派在空间的挪移中最终完成了他从东方走向西方的朝圣之路。因此本文认为，空间想像在理解本小说人与动物关系、帝国与殖民地的文化隐喻等方面产生着重要意义。《少年派》中的空间想像呈现为从东方到西方的旅程，这一旅程一方面呈现了西方的东方想象、西方规训与惩罚模式的东方再现，更表征了已经移居西方的东方流散者主动的文化剥离。这使得《少年派》不只是在时间—历史语境中以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建构来认识东—西方文化，更是在空间—全球化场境中以西方视角审视的人与动物关系的再现，由此可以深入理解流散者的东方主义内化意识与作者本身的东方主义观念。

一、空间研究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空间意识

正如沃福与阿瑞斯(Barney Warf & Santa Arias)在《空间转向》中所指出的，“空间、地方、绘图和地理想象已经在很多领域成为了共同的主题，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在全球化强调了地点的重要性”(Warf & Arias 2)。如果说，在19世纪空间还只是附着于现代时间观念中巨大的工业革命时空下的一个现象，那么到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已经开始试图将空间介入到都市分析。及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列斐伏尔和福柯对空间观念的探讨，空间成为了研究资本主义整体性结构和功能的重要方面¹。

应该说，正是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生产”(Lefebvre 26)这一观点，突破了以往将空间看作社会容器的看法，被认为是“提出了一种将空间理解与社会现实本质上捆绑在一起的理论”(Goonewardena et al. 28)。列斐伏尔反复指出，我们不仅研究空间的历史，也研究表征的历史，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它们与实践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历史不仅是这些空间的诞生地，而且是与特殊社会或生产模式的空间实践相互联系、扭曲、移置或相互交织的²。因此，空间与时间相关。空间是社会现实的共时性秩序，时间是社会生产的历时性过程。社会空间与社会实践的生产都基于人类的消

1 见于 Warf 与 Arias 在《空间转向：跨学科视角》(*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前言中对空间研究进行的详细梳理。

2 见于 Lefebvre 在著作《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 Ca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中对空间研究的认识(第42页)。

费，整合于社会实践。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了社会现实的三重形象，第一重即物质社会实践。第二重是知识、语言和书写文字共同构成的一种既抽象又具体的权利、既被动又限定的存在。第三重则是超越性的存在。因此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念将空间理解为“不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物质的东西，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活生生的、主体性的存在”（Warf & Arias 20）。

列斐伏尔由此将空间研究拓展到社会文化维度。与列斐伏尔类似，米歇尔·福柯在1960年代同样指出了空间研究的社会文化意义，并发现乌托邦、异托邦与文化上的关联。他认为，我们生活的地方/场所（site）就是关系的网络。“我们生活的空间，将我们从自身扒拉出来，其中我们的生活、时代和历史被侵蚀了，趴在我们身上，了解我们的空间就是空间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空间”（Foucault 23）。福柯用乌托邦（utopia）和异托邦（heterotopia）描述这种异质空间。在他看来，乌托邦是一个不真实的空间，异托邦则可能是一种混合的、联结的体验。以镜像为例，镜像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通过镜像，我们看到自己在那里，但它本身就是一种缺席，因此就是镜像的乌托邦。但镜像本身也是异托邦。因为镜子的确存在于现实之中，它对人们所占据的地点存在一个相互作用。从镜子的透视，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对于所站在的地方就是一个缺席，因为可以看到自己就在那儿。从这种注视来说，它将我们自己从玻璃另外一面的虚拟的空间立场直接导向我们自己，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这也意味着我们开始再次将自己的眼睛投射在自己身上，重新建构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站在那里的自己。福柯将这种镜像功能指称为异托邦。“它使得我从玻璃看自己、在这个时刻占据的地点立刻成为绝对的真实，在联结所有围绕着这个地点的空间时，它成为绝对不真实的场所，因此为了被想像，它必须超越已经在那里的虚拟点”（Foucault 24）。这也意味着，异托邦其实指向了我们生活的空间、社会文化的空间和想象的空间，而无论是我们真实生活的空间，或者那个指向我们想象的空间，都是我们社会文化的反应。因此通过空间研究可以认识我们自己真实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索亚（Soja）由此出发提出，“福柯的异托邦在我们的每一个社会中形成，不过是随着时代不同而发生了形式上的改变”（Soja 20）。在吸收福柯的观点基础上，索亚重新梳理社会理论批判史，发现后现代地理就是一个空间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生产。由此索亚进一步扩充了现代空间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

哈维（David Harvey）则以马克思主义批评进入空间研究，推动现代社会思想对空间与空间性进行重新评估。他发现，通常意义上人们将空间看作是一个被给定的、被生产的东西，而当代社会理论研究者则对此进行了重新思考，认识到空间在建构并改变社会生活以及呈现社会生活深层权力的不同特性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哈维的马克思主义空间化，以及空间的马

克思主义化，在商品生产和商品转化为金钱的深层结构上都起着核心作用，产生出时空转变中的生产与劳动过程的模式”（Warf & Arias 20）。

上述空间研究的发展历程呈现了空间转向的由来，以及空间研究在社会文化领域产生的积极意义。空间研究随着全球化理论以及全球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在当前学术界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空间研究还被积极纳入当前的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也由此成为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热切关注的领域。

空间（space）或者说地方（place）本身在后殖民批评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萨义德（Edward 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探讨后殖民空间的文化意义时指出，殖民文化与空间的关系反映了帝国撤退后在殖民地仍然发挥统治作用的西方文化的强大。“社会空间的基础是领地、土地、地域和帝国与文化竞争的实际地理基础... 帝国主义和与之相关联的文化都肯定地理和关于对领地的控制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地理的观念决定其他观念：想象中的、地貌上的、军事的、经济历史上的和大体来讲文化上的观念”（萨义德 107）。后殖民批评家阿什克洛夫（Bill Ashcroft）在《后殖民研究关键概念》中也指出，“地点和移置的概念阐述了被殖民人们语言、历史和环境与认同建构过程中的空间和地点的重要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交缠”（Ashcroft et al. 161）。不过，后殖民批评的这种空间观照主要还是聚焦在生活于殖民地与宗主国中的人们身上，而较少考虑人与动物、植物甚至整体自然的关系。

在此基础之上，迪龙格雷和汉德雷（DeLonghrey & Handley）综合了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中的地方感，由此强调地方空间产生的政治、文化意义。她们认为，地方具有无限的意义和形式，既可以是所限定的地理意义上的帝国扩张、环境意义上的荒野或都市场景、谱系学上的共有祖先与土地之联系、也或者是现象学上的身体与地方的联结。这意味着空间与时间、历史、文化关联在一起。而当我们把空间视角置于后殖民生态环境之中时，我们会发现，以往后殖民批评研究设置了地方的概念来质疑殖民权力所提出的以进步的时间性为叙事的模式，而现在我们则需要更多的将空间、地方纳入到后殖民的历史叙事中。迪龙格雷和汉德雷由此指出，当我们质问，“在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否定地方土地所有权的时候，当污染、土地荒漠化、森林枯萎、气候恶化以及全球环境恶化的形式强力地提醒我们，在任何给定空间中呈现的生态相互依赖性时，是什么产生了对新颖的地方感的需求？”（DeLonghrey & Handley 4）这个问题将生态意识与地方经验、空间想象整合在一起，强调应采用时间—空间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地方和空间。“地方将时间进行了代码，这表明镶嵌在土地和海洋中的历史总是为我们理解居于转变中的帝国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帝国试图来镇压的反殖民认识论提供了重要的、动态的方法论”（DeLonghrey & Handley 4）。或者换句话说，后殖民空间呈现了东方主义与反东方主义策略的对抗与妥协。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空间已经与文化、社会、生态、地方等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我们理解故事文本的重要视角。尤其是在《少年派》中，多重空间的交替展映了东方世界中人与动物的乐园、第三空间中人与动物的幸存、西方世界中人与动物的剥离，以及随着空间交替而逐渐裸露的矛盾而又坚决的文化归顺。这俨然成为了文化流散者在空间想像中内化的东方主义。

二、本地治里的动物园：人与动物关系的东方幻像

少年派的原居地本地治里是一块后殖民飞地，后殖民国家印度的法语区。根据小说描述，“本地治里曾经是那个最小的殖民帝国——法属印度——的首都。法国人很想与英国人竞争，非常想，但是他们惟一取得的只有对几座小港口的主权。他们在这些港口坚守了大约三百年。1954年，他们离开本地治里，留下漂亮的白色楼房，垂直交叉的宽阔街道，诸如海运大街和圣路易大街之类的街名，还有对警察戴的帽子的叫法——凯皮”（马特尔 23）。在似是而非的东方，少年派崇奉着三种宗教，快乐地生活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父亲拥有动物园）中。而动物园本身也成为虚构了着和谐的人与自然、动物关系的场所。

《少年派》中是这样描述派父亲管理的动物园。“那是一个巨大的动物园，蜿蜒绵长，大到需要使用火车在园中观赏”（马特尔 13）。派以无限惆怅的语气回忆起在这个亚洲动物园中的美好景象：“这里炎热又湿润，沐浴在阳光下，植物颜色鲜艳。花儿怒放，绵延不绝。树木、灌木丛和爬藤多姿多彩……。在这些植物之中安放长凳。在长凳上，你会看到睡觉的、伸懒腰的人们或者情侣坐在上面。年轻的情侣彼此害羞的瞥一眼对方，他们的手在空气中颤动，悄悄握在一起。突然，在高大细长的树木之间，两只长颈鹿探出脑袋看着你。…”（马特尔 14）多么美丽的伊甸园啊！多么和谐的人与动物、自然的共存！派本人也说，“对我而言，它就是地球上的伊甸园”（马特尔 15）。

在帕特尔（成年派）的回忆中，本地治里的动物园成为了人类的乐园。但如果仔细思量在这样一个被占领和管理的土地上呈现出对动物领地的占领与管理，它非常有趣地再现了殖民主义与人、动物的关系。动物园只是想像中的乐园，它本身就是一个以西方模式进行规训与惩罚的他者。少年派与他的家人则成为了西方在印度的代理人。

从动物园的产生历史来看，它源自中世纪历史悠久的动物展览。以福柯的规训权力观念来看，动物园本身就是一个供人类观赏、娱乐、监控动物的地方。规训权力是作为一种监视和控制的形式，内化在控制和被控制的人身上。规训权力的目标就是来产生服从性的、温顺的身体。通过监视、强迫的规训行为，让人们将服从和温顺内化成某种社会标准。规训权力也是统治个体的最关键的工具（Foucault 1977）。泰勒（Chloe Taylor）发现，正如其他学者所认识到的，福柯虽然没有强调过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权力关系，他在《疯

《文明史》中仅有的几次对动物性或者人类—动物关系、动物与动物性的探讨仍然可以作为人类与人类经验的隐喻，福柯的观点仍然适用于我们探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规训与惩罚。因此，“尽管福柯自己并没有着力去分析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批判性动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文学已经在过去十年中运用了福柯的观点来进行文本分析。... 很多学者采用福柯的方式来思考农业之中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怎样能够被概念化为主权、生物权、学科权和田园牧歌权，以及思考为什么我们也可能根本不认为这些是权力关系”（Taylor 539-540）。克鲁鲁（Matthew Chrulew）则明确提出了应该对动物园的设置与管理重新进行文化思考，认为动物园里明显充斥着福柯批判的权力话语。这些活着的动物在动物园是被展示的，是作为人类的参观对象和启迪对象，动物园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就成为了人类为地球挽救灭绝动物的活标本聚集地。动物园就好像是动物们的一艘诺亚方舟，保留物种，同时也表达人类对猎杀动物并迫使它们濒临灭绝的一种赎罪¹。由此出发，我们认为，动物园其实就是福柯所描述的异托邦，被建构在权力的生产关系之中。具有异国情调性质的动物和本土动物被权力技术捕获并保留下来，然后它们被制定秩序并被展示、被喂养、被测试、被归档和被保留、被挽救和被暴露，成为人类需要的一个他者。正如克鲁鲁尖锐指出的，“我们审视动物园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动物生命是怎样在公开的生物权力中生活的”（Chrulew 2011）。

回顾本地治里的动物园，审视《少年派》中的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本地治里动物园的管理经验，以及潜移默化在派身上的人类驯化凶猛大型动物的权力策略（派后来将这种策略运用在救生艇上对孟加拉虎的驯化），很显然派的父亲加强了这种动物种族主义和生物政治的观念。父亲告诉派，老虎是非常危险的动物。为了加强派的认识，父亲做了一个试验。他命人带着一只活山羊进入到老虎的铁笼，让派亲眼看到老虎怎样凶残的吃掉山羊。父亲然后警告，“永远不要忘了这个教训”（马特尔 38）。这是典型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真相。但父亲作为动物园主人，以双层铁笼完全控制了这些不同等级的动物，并将其作为一个启迪人类和供人类思考的客体。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了解到胡根和蒂芬（Graham Huggan & Helen Tiffin）在《后殖民生态批评》一书中对动物与后殖民主义之间内在联系的详细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少年派》这部小说一定要将故事放置在这个印度后殖民地。派父亲的这种行为并不仅仅呈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等级关系，更是一种东—西方关系的隐喻。胡根认为，在动物、人类和西方之间存在着三种

1 克鲁鲁的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一篇论文“在动物园中经营爱与死亡：濒危物种保护的生物政治”。See “Managing Love and Death at the Zoo: The Biopolitics of Endangered Species Preservation,” *Australian Humanities Review* 50. May (2011): www.australianhumanitiesreview.org, 其中他对人类开设动物园的动机与文化功能做了细致阐述。

模式。动物与后殖民主义之间的第一种模式是人类个体和文化在不同的世代被主流族群看作是“动物般”的，而且人类大屠杀和奴役从某些时代已经预设了他种民族被当作是动物的范畴。第二种模式更多发生在当代，人类在日益减少的资源竞争中陷入了对动物的反对中。人们被迫离开土地以此提供公园来为外国游客展示游戏，而这里我们理解的不只是将人类类比为动物的含蓄表达，也是动物本身的物理呈现。第三种模式则是在后殖民语境中来自任何尝试质问物种疆界的困难，这里关涉到一些方法如在某个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族群对待动物的方法被用来贬低、歧视或边缘化其他人类族群，如在西方社会的移民就被认为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动物¹。这三种模式其实将福柯的生物政治推进到文化政治，从而产生出人们对东—西方关系的生态审视。因此，本地治里的动物园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它既满足了西方殖民者的异域风情想象需要，同时也昭示了西方殖民统治对本土印度的圈禁和控制。建构在这种生物政治基础上的西方文化逻辑深深贯彻在派的家人脑海，他们已经成为西方在殖民地的经济本土代理。所以当他们面临新印度政治时，他们厌恶并批评印度，并为自己找到逃离的理由。“动物园要兴旺发达，就需要议会政府、民主选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法治以及印度宪法所奉为神圣的其他一切。长期糟糕的政治局面对生意非常不利”（马特尔 87）。“在父亲心里，新印度破碎了，倒塌了。母亲同意了。我们要逃离这里了”（马特尔 88）。派的一家带着厌恶和愤怒逃离印度，他们希望寻求生物政治顶端的西方庇护。因此在大海上的漂流中，少年派将西方的规训动物模式使用娴熟，让自己安全抵达海岸。这也是为什么在叙述派的东方故事时总是掩映着多伦多的踪影。而相对于本地治里的迷茫和寻觅，多伦多就明显呈现了派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浓厚的幸福感。

劳拉·赖特 (Laura Wright) 在解释作者将故事的场景设置在印度的原因时则认为这反映了作者马特尔叙述的多种双重性。马特尔在《少年派》中的双重性表现在“殖民/被殖民的双重性也标示在作者笔下的人物、派和人类/动物双重的关系中，这同时表明在文化和自然之间进行假设的对象的不同”(Wright 69)。因此印度的后殖民性与人类/动物的关系密切关联在一起了。动物园和后殖民地本地治里之间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结合。正是因为法国人、英国人的介入而产生了本地治里的都市化和异国情调的动物园，并虚构了一场人与自然、动物的相互钦慕之故事，这本身就形成一种审美的张力。而这种审美张力一直贯穿在 19 世纪以来英国文学探险小说中，以鲁滨逊神话为典型。“鲁滨逊神话的持续热度强调了天堂的过去及其与殖民历史的持续性关系，以及它在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幻象，现在产生在旅行主义话语

1 胡根与蒂芬对动物与后殖民主义之间的三种文化关系论述详见两人合著的《后殖民生态批评》中对动物主义批评的阐述。See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135-137.

和后殖民异国情调中”(Deckard 1)。迪卡德(Sharae Deckard)还发现,以地理扩张动机而展开的欧洲探险和殖民在文学上被虚构成为一种将帝国话语和现实合法化的神话,最终成为反映新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反讽主题(Deckard 2)。我们则认为,即使在西方文学以异国情调式的浪漫手法处理印度殖民时期的人与动物关系,其中也不乏协商的罅隙。派的父亲作为动物园的管理者,努力在动物园与孩子之间填补西方—东方的理性和知识罅隙,这也意味着印度人并不愿意完全成为被臆想的观赏对象,而更愿意主动向西方靠拢,积极寻求人与动物的理性关系。

三、作为“第三空间”的太平洋与救生艇:人与动物关系的异托邦

大海作为一个公共领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据之为已有的公共地理空间,也是我们理解的“第三空间”,即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种族和文化的方。以索亚的观点来看,“‘第三空间’同样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创造性的重新组合和拓展,它的基础是聚焦于‘真实’物质世界的‘第一空间’视野,和根据空间性的‘想象’表征来阐释此一现实的‘第二空间’视野”(Soja 6)。因此,第三空间超越现实与想象,是一个汇集差异性的地点。巴巴介绍了詹姆逊的“第三空间”概念,即后现代政治的“第三”空间为“介入”开放了一个领域,由此新颖的文化实践和历史叙事产生出“属性的不调和”,“让人无法预测的并置”、“现实的半自动化”、“后现代精神分裂—碎片作为对现代或现代主义焦虑和歇斯底里的反对”(Bahbah 216)。显然詹姆逊将第三空间看作是一个建构国际主义的矛盾结构。霍米巴巴则将全球本土性看作是“第三空间”,即在全球与本土的双重结构之中的居间空间,这里存在由认知性的含糊所标示出来的历史原创性,在转换的、或“现在”紧迫的、暂时性的时间性而指涉的非中心化的“主体”(Bahbah 216)。换句话说,在一个居间性的空间中而产生出主体身份的含混。

《少年派》中派的一家人乘坐日本货船在太平洋上失事。船只失事时,派和孟加拉虎、鬣狗、猩猩和斑马落在救生艇上。因此救生艇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国家、地点的地方。但有趣的是《少年派》述说了关于救生艇的两个故事,这导致救生艇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船只失事和幸存的故事,而成为一种后殖民生态指涉,成为一个全球本土性罅隙之间的认同突围。它本质上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土地/领土之争。

关于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有学者将其看作是一种“人类动物贱民”的类比(Bartosch 199)。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胡根与蒂芬的后殖民生态论述,后殖民地人民通常被宗主国鄙视为动物类的人类。孟加拉虎被赋予人类的字本身就被看作是一种喻指。巴托什(Roman Bartosch)发现,马特尔小说中的这一情节很明显取自美国小说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阿瑟·戈登·派姆的叙述》(*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在故事中,帕克是一

个人。这也是一个沉船叙述。帕克和一群人在长时间疲惫的旅行中没有食物和水，这导致人们要吃其中一个海员。帕克画了一个稻草人，最终他成为被吃的对象。因此巴托什认为，在文本中所产生的名字和命名的问题和相互关系上，文本模糊了人类和动物的分界线，而这本身也产生了一种“非动物化的对待”的感觉。巴托什引用德里达的话说，“他者能被称作动物性的、非自然化的东西，是动物性形象的产物，在人们认为他者足够怪异的地方就会获得名字上的改变” (Bartosch 201)。因此孟加拉虎帕克成为被西方帝国主义意识之下的动物贱民所指。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容易理解派和孟加拉虎的相处和统治权力的争夺。

《少年派》详细描述了派和帕克的领地之争。派知道动物有用排泄物宣告自己领地的行为，派也用自己的尿液来宣告自己的领地所有权，但他同时还用在动物园中训练猛兽时使用的口哨来威吓。“我这样做，以我的眼神困扰他（当然对任何动物而言，包括我们自己，盯着看就是一种攻击性行为），并用口哨来发出尖利的声音，这就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一个征兆性的联系，通过这些方法，我明确地告诉理查德·帕克，这是我的权力，我的主人权力，可以想怎样就怎样的拨弄和鄙视他的排泄物”（马特尔 234）。派和帕克的领地之争提醒很多学者思考《鲁滨逊漂流记》的遗产。人们发现，《少年派》的故事可以归入鲁滨逊漂流记、格列弗游记等一系列西方冒险故事行列中。“这是一个海上灾难的故事，同时也是少年长大成人的神奇幸存故事”（Atwood May 5）。但马莱克却指出，鲁滨逊的探险故事反映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圈地运动，在海外扩张过程中他们对土地的持续诉求，甚至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下西方资本在各民族国家的类似圈地运动。他认为，正是西方资本自产生起对土地执着的掌控欲望，使他们畏惧从未了解的自然，迫切地想以种植、驯养和圈禁的方式来昭示对土地的统治，以此确定自己的权威。因此《鲁滨逊漂流记》中，当鲁滨逊第一次看到荒岛，他充满了焦虑。他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逐渐放松下来，建立了一系列的圈地活动，并逐渐覆盖了整个岛上的风景，进一步完成了“他身负的大英帝国的社会象征秩序”（Marec 2）。因此，鲁滨逊是通过圈地建构了岛上的秩序，西方殖民者也以此方式在殖民地获得了其统治合法权¹。

救生艇上少年派与孟加拉虎之间的关系也完全可被看做是西方海外拓殖的一种投射。少年派俨然成为了海上的鲁滨逊，在救生艇上展开了自己的圈地运动和主权宣告。在派与孟加拉虎的斗争中，作者不断强化着领地的问题。孟加拉虎强势地占据了救生艇，而派则只能栖息到自己做的救生筏上。因此救生艇就是一片可怕的、被野蛮动物所占据的地方。对于这一为孟加拉虎占

1 马莱克在《文学的生态与后殖民研究》(An Ecological and Postcolonial Stud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中对《鲁滨逊漂流记》隐喻的英国圈地运动、全球土地征服与帝国意识形态建构之间关系进行了细致论述。

据的领地，派以物质基础（各种鱼和水）与精神控制（口哨）来进行驯化孟加拉虎，达到建构主权的目的。派正是以西方文化模式完成了他在海上的征服旅程。鲁滨逊因为海难漂流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孤岛，他凭借着西方文明的遗产（枪、圣经、种子、蜡烛、科学）在岛上生活了27年，驯化了土地（进行种植并获得物质资源）、人民（星期五），建立了自己的岛国，并最终成功地回到英国，获得自己的传奇人生。派同样在救生艇上，凭借着西方文明遗产（物质上的挪威饼干、科学-蒸馏水器、求生指南）在海上漂流了227天，驯化了凶猛的孟加拉虎，并最终得救。两者都体现了个体的冒险精神、顽强意志与人类智慧。或者说，两者都体现了人们可以凭借着西方科学和理性精神在第三化空间完成支配和统治他人的过程。

正如阿姆斯特朗（Armstrong）所嘲弄的《少年派》中的环境主义装饰，以及他所得出的结论，“尽管这是一个简单的印度男孩的简单故事，马特尔的小说拒绝地点的特殊性，以及自由漂浮在历史上的、地缘政治的语境，因此在这样做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对于（旅游者、所有消费者、特权的、全球的、西方的）人类精神的权力的狂想曲”（Bartosch 201）。而在派讲述的第二个更为“现实主义”的故事版本中，帕克消失了。所以这里也传达出来人们的一种想象，第一个故事是第二个真实故事的隐喻式呈现。巴托什将其归咎为小说的叙事策略。在第一个故事中，作者构建了一种“人类—动物共同体”的想象，正是通过这种想象不断反映出并指向虚构和真相的问题。“《少年派》允许我们来看人类中心的寓言和生态中心的动物故事之间的虚构空间。这种空间成为了人类动物的一个地点... 设置动物的位置并不意味着全面来理解它。反而是，这意味着这一人类形象的价值是对感伤的、谬论的这种价值观的一种协商”（Bartosch 206）。

第二个故事完全以残忍的方式再现了人类不同种族之间的争夺和杀戮。这也再次表明，处于第三空间太平洋救生艇上的冲突事件成为了人与动物（西方与东方）的异托邦，以温情的人虎共存的关系批判了现实世界西方对东方的霸权与西方观念的世界统治意识。

四、多伦多的生活 —— 一种后殖民怀旧

《少年派》的故事正式开始于多伦多，来自于作者对成年派（帕特尔）的采访，尽管着墨不多，但行文之中多伦多与印度本地治里之间的相互映照形成了鲜明对比。本地治里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反复纠缠在多伦多的现代生活中，呈现出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印度裔移民对过去的怀念与疏离，以及心灵深处的文化创伤。这也是小说开篇就呈现的基调。派说：“我爱加拿大。我想念印度炎热的天气，那里的食物，墙上的四脚蛇，银幕上的音乐剧，大街上闲逛的牛群，呱呱叫的乌鸦，甚至关于斗蟋蟀的闲话，但是我爱加拿大。... 不管怎样，本地治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回家的东西了”（马特尔 6）。多

伦多成为了派的家，他的根，是他完美家庭的所在地。因此在这一基调之下，派对他印度生活的回忆以及他与孟加拉虎在太平洋救生艇上的幸存在故事中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后殖民怀旧。

如果说“怀旧 (Nostalgia) 是跨越历史和民族及个人疆界将人们联结起来的一种奇怪方法，它“融合了个人和社会欲望推动人们对构成它的时间和地点的记忆的探寻” (Walder 1)，那么后殖民怀旧则是基于 20 世纪帝国撤退后跨文化和跨民族冲突、移居的经验和表征认同与强化，是长期缠绕于殖民主义和解殖主义历史的一种特殊回应，是如萨尔曼·拉什迪所描述的“我多么想回到我的过去，但回到的并不是古老家庭影集所拍摄到的褪去颜色的灰白照片中，而是电影模式的、充满着煌煌技术大片的整体记忆之中” (Rushdie 9-10)，是站在国家之外来试图描述自己曾经来自的那个世界，以破碎的镜像、充满着碎片的方式来处理不可避免的遗失的过去。

过去印度的生活成为了浪漫的、美好的回忆，而孟加拉虎和派在海上漂流时光则成为了刻骨铭心、难以割舍的对印度的留恋。成年派反复在说，“理查德·帕克仍然和我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忘记他。我敢说自己想他吗？我敢这样说。我想他。我仍然在梦里见到他。大多是噩梦，但却是带着爱的气息的噩梦” (马特尔，6)。孟加拉虎在精神和文化上对成年派的纠缠，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派对他身上印度自我的渴望，而这种自我却越来越离他远去。他只能以在大多伦多的家中秉持着印度人的生活习惯来回味自己的过去。“每次我去拜访，他都准备一桌丰盛的印度南部的素食盛宴” (马特尔 43)。

派的这种后殖民怀旧甚至隐藏的东方主义观念是作者马特尔帮助他完成的。因为作者不断在《少年派》故事中的介入，派的多伦多生活笼上了一种新东方主义的面纱。这取决于马特尔的叙事技巧。

整部小说以纪实的方式呈现，包括作者讲述他在印度的遭遇，将整个故事置于一种虚假的真实场景中，而小说正文中作者的采访模式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真实特性。尤其是派讲述了第二故事即日本船只失事调查团对他的质问，作者还以获得日本调查团的访问录音作为真实对照，进一步强调了故事的真实确凿性。而正是在这种真实与虚构之中，作者置入了自己的东方主义意识，并将这种东方主义意识坚定地套在了印度裔加拿大人帕特尔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成年派在文化上和生态上对印度特性及其颇具隐喻的动物特性的剥离。正如米诺里·撒拉朵 (Minoli Salgado) 在英联邦文学中描述的东方主义再现，即文化合法性下面掩藏的重新东方化的深度焦虑症候。而这种焦虑症候更多反应在流散和民族主体立场上进行的深度重估。最反动的是，这种再东方化会加深东方主义者话语本身的差异性¹。换句话说，东方主义的再现反应出这

1 Salgado 在论文“重新东方化的新图像” (“The New Cartographies of Re-Orientalism,”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 Vol.46 (2011): 199 — 218) 中特别对居于西方的东方移民自我有意识的东方化进行了描述与批判，称其为重新东方化。

些在地理和文化上离开了母国的流散者他们对待母国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派说他回不去印度的原因，尽管他梦萦魂牵孟加拉虎，但最终是在多伦多收获他的幸福。因此这里既呈现了流散族群本身回过头看待母国文化的东方主义意识，也反映了作者本身的东方主义观念。

因此，多伦多作为西方表征的中心，它与本地治里和太平洋的空间投射相映成趣，多伦多成为了类似于殖民时期诸多浪漫探险小说的终点：探险之后，回归西方，获得幸福和美满。派在动物园的美好生活终究成为了浪漫的东方幻象，派与孟加拉虎在海上的漫长漂流也成为了东西方文化权力的角逐，最终成就了在多伦多中心生活的印度裔少年派的沉稳幸福生活。这再一次将人与动物的关系置于了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关系中，成就了后殖民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空间想象和潜在批判。

结语

从上述三个空间的表征与东西方关系的再现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站在西方话语语境下的扬·马特尔还是难以避免西方对东方的猎奇和异国情调想象。只不过马特尔聪明地选择了时下人们比较有兴趣关注的人与动物的关系、海上人与动物的幸存事件，因而掩盖了其中后殖民批评所经常探讨的西方对东方的审视与猎奇、东方向西方的学习与归化，以及类似探险小说中最终将西方作为美好之地的渴望。本文认为，最值得思考的还是在西方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注视之下，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如何掩映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之中，这两种关系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密集的移民活动中呈现出其本质性意义。因此《少年派》的空间想象不仅是东方向西方的地理推移，更是心理上从东方向西方的皈依。它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延展了介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个体认同，扩大到人对周围环境、流散者对于过往的记忆、世界人类与非人类的共存，从而也推动了后殖民生态文学的发展。

[Works Cited]

- Ashcroft, Bill, et al. *Postcolonial Studies: Key Words* (secon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Atood, Margaret. "A Tasty Slice of Pi and Ships." *Sunday Times*, May 5, 2002.
- Bhabha, Homi. *Locations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4.
- Bartosch, Roman. *Environmentality: Ecocriticism and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Fiction*.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13.
- Chrulew, Matthew. "Managing Love and Death at the Zoo: The Biopolitics of Endangered Species Preservation." *Australian Humanities Review* 50, May 2011. <www.australianhumanitiesreview.org>
- Deckard, Sharae. *Paradise Discourse,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Exploring Eden*. London and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DeLoughrey, Elizabeth & George B Handlay, eds.. *Postcolonial Ecologies: Liter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 Oxford: Oxford U P, 2011.
- Dwyer, June. "Yann Martel's *Life of P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hipwreck Narrative."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2. Vol. 35, Fall (2005): 9-21
- Goonewardena and Stefan Kipfer, Stefan. Milgrom, Richard. Schmid, Christian ed.. *Space, Difference, 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bv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8.
- Foucault, Michel.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 Vol.16 (1986): 22-27
- *Discipline and Punish: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77.
- Huggan, Graham. Tiffin, Helen.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lden., Oxford & Ca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 扬·马特尔:《少年Pi的奇幻漂流》,姚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 [Martel, Yann. *Life of Pi*. Trans. Yao Yuan.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2]
- Marzec, Robert P. *An Ecological and Postcolonial Stud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 London: Granta Books, 1991.
-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Trans. Li Kun,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3.]
- Salgado, Minoli. "The New Cartographies of Re-Orientalism."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 Vol. 46 (2011): 199-218
- Soja, Edward W.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9.
- Taylor, Chloe. "Foucault and Critical Animal Studies: Genealogies of Agricultural Power." *Philosophy Compass* 8/6 (2013): 539-551
- Wright, Laura. *Wilderness into Civilized Shapes: Reading the Postcolonial Environment*. Athens & London: the U of Georgia P, 2010.
- Walder, Dennis. *Postcolonial Nostalgias*. Routledge, 2011.
- Warf, Barney and Santa Arias. *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责任编辑:杨革新